



前近代中国社会的 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

QIANJINDAI ZHONGGUOSHEHUI DESHANGREN
ZIBEN YU SHEHUI ZAI SHENGCHAN

张忠民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前近代中国社会的 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

QIANJINDAI ZHONGGUOSHEHUIDESHANGREN
ZIBEN YU SHEHUIZAISHENGCHAN

张忠民●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范一辛

学者书库·史丛

前近代中国社会的
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

张忠民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261-6/F·368

定价:15.00 元

CD218/04

序

《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是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于前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本兴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行业种类与人际关系,地缘影响与交通网络,城镇分布与地区划分等等,作出了全面论述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全书命题立意,在理论思想上既有正确秉承,在分析论证上俱存史实依据,而所持的思维方式和独到见解,更具有其系统性和启发性。读后余思,颇令人怀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作者在书中化了很大的功夫,力图显示出中国商人资本的活动范围、走向,及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历史作用。书中的科学论证,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开拓创造精神。在写作中,作者根据大量可靠的资料,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和辩证方法,归结出许多令人信服而无可置疑的论点,充分地反映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渊源的应然与社会发展的必然。

书题以中国历史的“前近代”为时限,此适值中华封建帝国明清两代延续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时期;而其社会经济的基本条件,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则为农村小生产与市场大流通处于尖锐的矛盾形态之中。似这样的时、空与特殊社会条件际会交织在一起,虽然同西欧经济先进国家的历史相比拟,既谈不到资本的原始积累,更谈不到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而所谓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及文艺复兴等历史发展进程,那就更无从说起了。但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却可以说是处于明夷之际,依靠着自身的机制,

跬行禹步地重复行进。此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概括指出的,“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依靠自身的机制,实现一种内部的自我调节,是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能延续的重要原因。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观之,一种社会制度的延续,首先是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延续,因此,当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再生产还能沿着自身的运动轨迹不断地延续时,这种社会制度就必然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以及存在的时空弹性和张力”。中国前近代商人资本本身所赋有的时空弹性和张力,是历经数千年各种动荡条件的考验而形成一种民族性的传统特色,其坚韧不拔的弹力和开廓不羁的张力,既有突破前进中各种障碍的历史前鉴可据,又有排除矛盾中相对势力的演变规律可循。

本书整体框架的逻辑性是严谨的,论析问题是深入实际的。特别是对中国前近代商业精神与商人资本的发育,能把国家的商业观及商业政策与民间的商业观念嬗变,以及商人精神和商业伦理,列为专章进行透辟的论述;对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分别列出前人罕谈的商人资本与再生产条件的补偿,商人资本与社会生产基金及消费基金,商人资本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及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双重作用等等。这些具有基本性而富有研究价值的论题,在现有研究成果中都是罕见的。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基础,用了很大的研究功力,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本书的研究写作,不仅在于史料依据的翔实,而更在于论证思辨的得体。作者考核分析的精审,学术器识的弘通,概可见矣。是为序。

海 城 马伯煌

1995年重阳于沪上香花桥畔之法华精舍

目 录

序	马伯煌
导 论	1
第一章 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	5
第一节 人口的增长及其移动趋势	5
第二节 生产地域的扩大以及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10
一、生产地域的扩大	10
二、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17
第三节 商品流通的拓展	33
一、流通地域的扩大以及商路的拓展	33
二、商品流通的发展	37
第四节 城市的繁荣与市镇的兴起	41
一、传统工商业大都市的进一步繁荣	42
二、重要商路沿线枢纽性商业镇市的兴起	44
三、农村地区市镇的普遍兴起及市镇网络的形成	49
四、边地商业镇市的兴起	55
第二章 商人资本的种类与职能	59
第一节 商品经营资本	59
一、贩商	59
二、牙商	70

三、铺商·····	88
第二节 货币经营资本·····	96
一、高利借贷资本·····	96
二、典当资本·····	106
三、钱庄、票号资本·····	118
第三节 官商和私商·····	127
一、官商的定义和种类·····	127
二、官商的特点及其作用·····	133
第三章 商人资本的地缘构成及地域分布·····	136
第一节 地缘与地域——前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特性·····	136
一、商帮的定义·····	136
二、地缘商人形成的原因及种类·····	138
三、地缘、业缘、地域——地方商人的三大特征·····	145
第二节 商人资本的地缘构成·····	147
一、山陕商人·····	148
二、安徽商人·····	156
三、广东商人·····	167
四、福建商人·····	173
五、浙江商人·····	177
六、江苏商人·····	182
七、山东商人·····	186
八、江西商人·····	190
九、其它地方商人·····	192
第三节 商人资本的地域分布·····	197
第四章 商人资本的经营及人际关系·····	203
第一节 商人资本的财产组织形式与人际关系·····	203

一、商人资本来源构成中的人际关系	203
二、商人资本的财产组织形式与人际关系	208
第二节 商人资本的经营及其人际关系	214
一、掌柜与朝奉——商人资本的经营及其相应的人际关系	214
二、伙计与奴仆——商人资本运转中的人际关系	219
三、商人资本经营中的宗族关系	224
第三节 会馆公所及其所体现的商人资本的人际关系 ...	230
一、会馆公所的分布	230
二、会馆公所的类型及其所体现的人际关系	238
三、会馆公所的功能及其人际关系	243
 第五章 商业精神与商人资本的发育	251
第一节 国家商业观及商业政策	251
第二节 民间商业观念的嬗变	257
第三节 商人精神及商业伦理.....	267
一、商人的从商原因及其相应观念	267
二、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敬业精神	270
三、商人资本的商业伦理道德	274
 第六章 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	285
第一节 商人资本与再生产条件补偿.....	285
第二节 商人资本与社会生产基金及消费基金.....	298
一、高利贷资本在社会生产基金及消费基金分配中的作用	298
二、商人资本与土地买卖	304
第三节 商人资本与社会财富再分配.....	309

一、商人利润的消费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309
二、商人资本与社会公益事业	312
三、商人资本在国家财政中的作用	317
第四节 商人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双重作用	322
后 记	329

导 论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今日的中国是昨日中国的延续，要推进今日中国的发展，仅有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对史学界、理论界来说，提供当代中国国情的历史说明应该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常说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如何为现实服务？牵强附会历史固不足言；杜撰、拼凑，甚至捏造史实以应现实政治之需要，更是误人、误国、误自身。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今日社会的形成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说明。在过去的研究以及现实生活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往往被理解和强调为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现实感，研究的问题应该尽量贴近现实，对现实社会有借鉴意义；而研究和实践现实者在考虑、研究以至解决现实问题时，是否应该多富有一些历史感，并注重从历史的积淀和惯性中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容易被忽略和轻视。在这里，对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为现实提供可靠的、有说服力的、与现实有真正借鉴意义的历史说明。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这就不仅具有了一般的学术意义，而且还会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当代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人民生活普遍还不够富裕，因此才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然而，中国为什么现代经济不够发达，古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令国人自豪，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以及漫长的经济发展历程。为什么从辉煌的古代经济中生长不出辉煌的现代经济，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研究近代和前近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是难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

在步入近代之前的前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历史导向的经济力量,这就是自然经济的力量和商品经济的力量。虽然在具体的存在形式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往往两者合而为一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单位或经济单位之中,如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小农家庭往往既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同时又是为市场提供剩余产品的小商品生产者;但在逻辑上他们却完全可以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意义就在于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导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论其自身多么发展,它至多只是原有传统经济形态的再造、复制和延续,社会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和根本的变革;商品经济则不同,商品经济在社会中的力量积聚以及空间扩张,势必会在适当的时候引发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它会将社会经济从一个形态导入另一个更高级的形态。处于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前近代中国社会,两种经济力量的并存与兴衰隆替表现尤为明显。从探讨和理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宏观角度出发,要了解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没能依靠内在的力量自觉地过渡到更高级形态的现代社会,首要的问题是要探索推动这种社会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力量为什么积聚不足。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代表力量主要是执行社会流通职能的商人资本,因此全面检讨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和观念形态的商业精神以及它们在当时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对于解答前近代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就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迄今为止,应该说无论是商人资本还是商业精神,都不乏研究者问津。关于两者的研究论著,即使不说是汗牛充栋,至少也是洋洋可观。但是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局部、个案上,其中虽不乏极为优秀的作品和富含发人深省的见解及独到的阐述,但

总难以表现出一种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总体上把握,并凭藉这一把握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问题。本书的研究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用自身的看法和见解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及其商业精神表现一种整体性的、有序的把握和理解。因此,本书既不是纯历史主义的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简单描述,也不是构造框架、营造体系的历史理论著作,本书所追求和希冀的是一种对历史存在的类型研究。具体地说,本书力图将商人资本、商业精神置身于前近代社会再生产的特定时空环境中,考察它们在该环境中的形成、变迁以及对该环境所起的作用。

在考察方法上,本书力图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从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商人资本的种类、职能、机制,以及商人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功能诸方面入手,着重探讨商人及商人资本在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具体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第一章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考察的是与商人资本的兴起和发展相关的社会经济内容。它们包括诸如人口的增长和流动,生产地域的扩大和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商品流通的拓展以及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等等。第二章商人资本的种类和职能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首先将商人资本按其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分成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两大类,然后进一步将商品经营资本分解成贩商、牙商和铺商,将货币经营资本分解成一般的高利贷资本、典当资本和钱庄票号资本,依次考察和分析它们的种类特点、行业分布以及存在形式等等,最后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甚具中国特色的官商和私商问题。第三章商人资本的地缘构成及地域分布具体考察了作为前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本最基本特性和特征的乡缘、地缘和业缘,论述了构成前近代中国

社会商人资本主体的各大地方商人的发生发展和具体经营状况。第四章商人资本的经营及其人际关系从商人资本的财产组织形式、商人资本的经营以及商人会馆公所诸方面入手,考察和分析了商人资本运动过程中在一般的经济关系之外所体现的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第五章商业精神与商人资本的发育从国家商业观、民间商业观以及商人精神和商业伦理三个层面,考察了商业精神的内涵、社会分布层面以及与商人资本发育的多重关系。第六章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条件补偿、社会生产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分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诸方面论述了商人资本在当时社会再生产中双重性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只是从流通领域的角度,以流通领域的主要职能阶层商人和商人资本为研究对象及切入点,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所作的考察。至于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考察分析尚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全面深入研究。

第一章 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的商人和商人资本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资本已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迄至唐宋,商人资本发展更为显著。到前近代的明清时期,商人资本的勃然而兴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这一经济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是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商品化成份的扩大与成长。它们具体地表现在社会生产中商品化成份的扩大、商品流通内容的增加、流通量与流通范围的拓展,工商业城市的繁荣,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市镇数量的增多上。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近代中国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人口增长扩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促使社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因此,对前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的考察,其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应是前近代中国社会人口的增长与变动。

第一节 人口的增长及其移动趋势

13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前近代中国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在此期间正明显地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即是人口的增长及其由此而引起的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13世纪前,峰值人口大多在5~6千万左右。汉代的文景之世,唐代的贞观年间,以及宋代的太

宗之世,中国人口都曾达到过它的几个峰值阶段。14世纪中叶,历经元明之际的战乱,中国人口又一次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在战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户口凋零,人烟稀少。顾炎武称:“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①。至元26年(1366年),朱元璋回家乡濠州,“所经州县,百姓稀少,田野荒芜,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明太祖登基之后,对发展人口极为重视。洪武元年即下诏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②。经过一段时期的修养生息,洪武26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已达6054.58万,户数达1605.28万,与元代鼎盛的元世祖时相比,户增340万,口增700万。如果考虑进户口登记中不可避免的脱漏以及对边远地区的忽视,实际的人口数可能还会更大些。在这以后,从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到明中叶的弘治、正德年间,直到明末的万历、崇祯年间,无论是中央政府的人口登记,还是地方政府的册籍中,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字不仅未见增加,反而出现下降趋势。

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登记户口数

洪武 26 年(1393 年)	弘治 4 年(1491 年)	万历 6 年(1578 年)
户数 10652870	9113446	10621436
口数 60545812	53281158	60692856

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19,户部6,户口1。

然而,实际上自洪武以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人口登记已只是越来越注重应役人户,人口登记实际上已逐渐转化为应役人口登记;另外,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和人为变动,民间人户的故意归并,地方豪绅的荫庇,官员的舞弊隐漏等等,在册户口数已大大少于实际户口数。万历《常山县志》称浙江常山县官府的人

① 《日知录集释》卷10《开垦荒地》。

② 《大明太祖高皇帝宝训》卷4《仁政》,卷6《谕群臣》。

口登记是“丁口有虚报,有实差。盖朝廷之典籍不敢阙,而差不以实,则民力不支,恐迫使逃绝,益消耗尔。吾常册丁万计,差丁千计,多寡不同”。浙江如是,其它省份情况也大同小异。“四川土俗,人丁欺隐之弊与湖广大略相似,与他处大不相侔。其大户或十数姓相冒合籍,而分门百十家,其所报人丁不过十数”^①。福建《连江县志》更直言不讳地声称,“自洪武十四年至是九十二年,户减八千八百九十,口减四万八千二百五十,是生亡其六七矣,何生息久而反凋零乎?抑恐多其数反为民累,任其脱漏弗之计也”。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在大量的历史资料中能得到相应的佐证,而且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所证实^②。有理由认为,到16世纪末的万历年间,中国人口已在1.2亿左右,较之明初大约增长了一倍。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中国人口再受重创。清顺治初,四川、江北等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康熙初,四川巡抚向朝廷奏称,“臣初至保宁,见民人凋耗,城廓倾颓,早不胜鳃鳃忧悸。迨泛舟遍历,日歉一日。惟重(庆)属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而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③。康熙10年,四川全省承粮民户仅47930余户,较明万历6年的军民人户262600余户减少了214700户。

在此之后,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特别是在康熙51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5年“摊丁入地”后,中国人口又重新增加。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初顺治年间中国的人口大约在0.8亿左右,康熙中叶则已超过1亿。较高的估计认为,1700年(康熙39

① 胡世宁:《胡瑞敏奏议》卷3。

② 何炳棣:《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

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已达1.5亿。在此之后的100多年中,中国的人口直线上升。仅据保守的官方统计,乾隆10年已达1.69亿,乾隆27年首次超过2亿,乾隆55年达到3亿以上,而到道光20年则更达4.12亿。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20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大致上增加了3~4倍,而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大致增长了6倍以上^①。

前近代中国社会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口——土地关系的急剧变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与人口增长相随的是人口的流动。

虽然,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封建国家都有限制人民流动的管制措施。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国家往往又对某些地区的人口流徙采取鼓励政策;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开发程度高低不一,民间的自发流动、移徙在所难免。前近代中国社会几百年间,不同规模、不同间隙时间的人口流动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

明代时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要数明初官方组织的移东南富民充实京师、凤阳,移各地军民充实云南;以及明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内地丘陵山地的自发性流动。明洪武、永乐年间,由官府组织,先后从江南苏松等地移往安徽凤阳、南京应天、以及北京周边地区的人口至少可达20万人以上。而由戍丁以及迁移人民组成的对云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人数估计可达百万以上。明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规模自发移民的主要移居地是汉水流域的郧阳地区。据官修史书记载,宣德3年,仅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成化4年,“四方流民屯聚荆襄者,已二三十万”^②。除上述规模较大、流向明确的人口集中流动外,有明一代经常、零星的人口流动始终存在。人口流动的原因,除了正常的外出

①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51~2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明宣宗实录》宣德3年闰4月甲辰;《明宪宗实录》,成化4年春正月甲申。